

導 言

游 鑑 明*

中國傳統傳記的書寫主要是在為世人訂立典範，書寫的內容有一定的原則和方式；在撰寫女性歷史時，更發揮的淋漓盡致。劉向撰寫《列女傳》時，就特別採取《詩》、《書》記載的賢妃貞婦，把女性分成母儀、賢明、仁智、貞順、節義、辯通、孽嬖等七類，做為勸戒天子「興國顯家」的法則，因此，後人書寫女傳都如法炮製。然而，當歷史敘事成為宣傳婦德的工具時，女性複雜多樣的形象和生活樣貌就被簡化。

走入近代，歷史人物的書寫不再有嚴格的要求，包括女性人物的敘寫也相當寬鬆，不但沒有特定的原則，女性自我書寫的例子也越來越多，一反過去定於一尊的範式。只不過，部分傳記文類，仍有意或無意的為人們樹立典範，從季家珍 (Joan Judge) 文中可以看到，立傳人如何為近代女性建構新形象，而胡曉真、羅久蓉、柯惠鈴則告訴我們，女性傳主怎麼包裝自我形象。

儘管如此，我們不能忽視近代人物的書寫體例已經鬆動，勾勒人物的素材也趨於多樣，除了一般人知道的自傳、傳記、回憶錄、口述歷史之外，小說、日記或者記載個人生平事蹟的文類中，都反映了歷史人物的生活點滴，讓人物的撰寫更加鮮活、立體。其中女性人物的書寫更是複雜，隨著受教育女性的增加和女性自我表述機會的擴大，雖然我們對近代女性人物的認識，可以不假借他者，但由女性自我呈現的歷史，有時反而不是那麼直接，如何從遮遮掩掩、瞻前顧後的女性書寫中，捕捉女性人物的真實歷史，對研究者來說，困難度和挑戰性都升高不少，需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

要細膩的解讀這群女性的作品，才有辦法揭開她們的面紗，柯惠鈴、胡曉真、羅久蓉都提醒我們注意這個問題。

20世紀初期，中國面對大的變革，不僅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受到衝擊，思想文化也起了很大程度的變化，許多知識分子藉由媒介的功能，以鋪天蓋地的方式，試圖將人們的既有觀念、行事作風，轉向他們所建構的藍圖裡，中國女性傳記敘事技術的轉變，便是其中一項。季家珍透過當時代期刊中的傳記專欄發現，在中國晚清文化重新評價和全球化脈絡下，這些專欄既撰寫中國傳統女性的故事，也翻譯或編寫西方女性的故事，並環繞著女英雄和女戰士兩種形象。有意思的是，專欄傳記中的中國或西方女性，都被以極具戲劇性的筆法呈現，並隱約顯示撰者有意打破賢妻良母的格局，換上積極參與政治或社會活動的另類女性。從傳記敘事的模式來說，季家珍認為，20世紀初期的中國女性傳記書寫，並不在於中國與西方典範的形塑，而是利用傳記的素材 (parabiography)，以再現中國本土女性和西方模範女性的方式，建構一套意識形態。而這套意識形態是配合這時期甚囂塵上的國族概念而產生，也就是把中國女性推向家庭之外，乃至走向世界舞台，和西方女性並駕齊驅，共同關心政治與社會。

同樣討論 20 世紀初期女性人物的書寫，也一樣通過期刊的材料，但和季家珍不同的是，胡曉真把焦點放在女性自我表述的層面上，她以三位受過傳統教育的女性為研究對象，觀察處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她們，如何因應新時代的到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從教育史、地方史或文學史，固然可以勾勒這三位女性的生平事略，胡曉真從 20 世紀初她們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議論文或遊記著手，卻更能掌握她們強烈的自我意識；換言之，通過這批由女性自我書寫的材料，我們看到的女性樣貌，遠比他者書寫更加豐富。胡曉真指出，這三位傳統才女，在塑造新時代自我身影的過程中，都是以婦女教育為志業，也都積極投入新式文字媒體，但對傳統道德和行為規範，或是新興事業的看法，卻明顯不同。劉璣、祝宗梁堅持賢妻良母主義，並傾向保守，但主張把傳統賢母的力量無限發揮，做為救國立民的基礎；施淑儀則認為妻、母的角色不能定義女人的成就，

同時強調女人必須求其遠大，奉獻於國家社會。進一步說，表面上她們有舊、新之別，在人生志業上卻表現了不畏艱難、創新開展的態度。胡曉真還注意到，這三位女性不同於明清女性文藝的議論文字，顯現女性書寫與表達模式在 20 世紀初期的一大轉變。

到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，具有自書能力的中國女性更為增加，女性自傳的內容遠比過去豐富，傳主不只敘述事功，還兼及個人的感情世界、政治情懷。但想掌握女性真實面貌的難度也跟著提高，因為她們除了以自傳文體表述自我之外，又往往經由其他書寫文體呈現自我；特別是知名度較高的女性，在書寫愛情、婚姻與政治問題時，不是那麼直接、清楚，常讓讀者陷入似懂非懂的情境中。因此，羅久蓉以抽絲剝繭的方式，在毛彥文、蘇雪林和丁玲不同時空的女傳書寫中，尋找其中意涵，她從時間、空間與國家認同三個角度，發現面對過去與現在、虛構與真實、遮掩與公開、以及大我與小我，女傳書寫出現互動與緊張的關係；也引領我們注意，女傳主如何藉由多層次形式，進行多元敘事。例如，毛彥文和蘇雪林這兩位來自五四時代的新女性，都在愛情和婚姻上諸多不順，傳統的包袱使她們面對這方面的表述，不免心存顧忌，而女性自傳書寫中的多層次自我表述，成為她們疏通情緒的管道，通過敘事對象和敘事角度的變化，她們試圖在走了調的人生中尋找生命的意義。比較自信又沒有較多傳統束縛的丁玲，應該可以勇敢的呈現自我，但從她把自己的人生交給共產黨之後，自我在集體中逐漸消融，導致晚年的自述滿是政治的刻痕，和前兩人相同的是，透過丁玲其他的書寫，我們才能稍微看清丁玲。

丁玲的例子，在許多女性共產黨員中，俯拾可見，但比不上丁玲的是，在沒有其他書寫材料可以參照下，讀者很難掌握她們真正的人生，讀到的盡是似曾相識的政治敘事。透過五位女性共產黨員的回憶錄，柯惠鈴試圖梳理出真實和虛構，她發現，這些回憶錄都是在 1990 年代之後才出版，受到政治環境的變化與回憶者自主意識的影響，由回憶者「再現」的內容與過去的經歷，形成矛盾和重疊；有意思的是，左派女性書寫因有過度的辯護，大部分敘事與政治作品幾乎無異，但對瑣碎事件的書寫，卻流露出

較真實的生活面貌。透過迂迴、遮掩與揭露的交叉書寫，這五位女性的回憶錄其實寫出中國女性的解放歷史。她們的記憶中，都有當時被視為「進步」的共同標記，包括自己退婚、罷課、退學、以及和不同男性開會、工作、集體出入等；可惜的是，這段獨立自主的生命歷程，在「做黨員」超乎「做女人」的政黨訴求下，往往被自我否定，柯惠鈴指出，是女性特質的掩埋強化了黨性。更進一步說，在特定時空產生的左派女性書寫，所記述的過去固然不乏真實，但有更多是為了符合中共塑造的女性形象。

綜括前述，強調婦德的傳統寫傳格式到了近代，不再是書寫女性或女性書寫的主軸，取而代之的是，女性自我表述下的多元樣貌，然而，受近代國族概念與政治認同的影響，女傳書寫套上了新的框架，這或許是傳記文類的流行風格，但不也是女性畫地自限的書寫方式，讓這群知識女性面對自己的歷史時，竟然如此躊躇。撇開公領域的問題，女性對個人情愛的書寫，是過去傳記較少碰觸的一塊，帶給讀者新的認識，然而，當情愛和道德、國家相遇時，私領域的敘述也一樣模糊不清。所幸，這類曖昧不清的部分，正留下一些值得討論的課題，攤開近代男性的傳記，他們的書寫模式是否也起了變化？他們又如何面對公、私領域的敘述問題？坊間出版的女性傳記或自傳，絕大多數以知識女性或女性公眾人物為主人翁，其他女性以何種方式形塑自我或被塑造？合併這兩類女性傳記文類，將為近代中國女性勾勒出何種圖像？

除此之外，從這四篇論文中，還有一個重要發現，不管被建構出的女傳或自書的傳記，近代中國的女性都積極參與社會或教育事業，她們的行腳落在各地，旅行、遷移成為她們之所以能放大眼光、改變生命經驗的基調。透過女性移居歷史的書寫，我們或許能對近代大批走出家庭的中國女性，做進一步延伸研究。

為和這四篇專論互為呼應，本專號「傳記文類與女性書寫」還收錄王東傑〈一個女學生日記中的情感世界（1931-1934）〉，以及沙培德（Peter Zarrow）對曼素恩（Susan Mann）《末代才女文化之風華再現》（*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*）一書的書評，將有助於我們在女性書寫的格式、內容與背後意涵等方面的深入研究。